

伦敦“中国政策研究会”文章《**东方仍然是红的**》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月五日节译转载二月号伦敦“中国政策研究会”简讯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东方仍然是红的》，全文如下：

在四分之一世纪史无前例的变革中，中国的真正革命外交政策，是经过审慎地设想，经常顶住了干扰而贯彻执行的。这是因为有了象周恩来这样的久经考验的马列主义者主持政府和外交工作，包括和外国政府的许多棘手的谈判。他一向按照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制订的战略部署而工作，永远记住人民的利益。由于他的坚持不懈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方面，中国人民对原则的任何放松或妥协，他们都会热烈欢迎。在毛逝世之后，中国的确面临重大的危险。如果“四人帮”没有被粉碎，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用阴谋和分裂手法取得的，无论他们口头上怎样革命，都是意味着在对内对外方面根本离开了毛的革命路线。对其他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

六年内的每一个声明和行动，克里姆林宫自然是密切注意的。他们希望找到中国减弱对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的反抗的迹象。在铲除帝国主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方面，中国人民对原则的任何放松或妥协，他们都会热烈欢迎。在毛逝世之后，中国的确面临重大的危险。如果“四人帮”没有被粉碎，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用阴谋和分裂手法取得的，无论他们口头上怎样革命，都是意味着在对内对外方面根本离开了毛的革命路线。对其他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

然而，密切地观察最近的发展，中国并没有改变颜色。在与其他共产党、人民和国家的交往中，仍然执行毛和周的路线。对华国锋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重要讲话中讲到的这方面的内容，中国的敌人不会感到愉快：“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幻想出现一种力量改变毛主席为我们规定的革命路线和方向……我们一定要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联合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一如既往，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将会在中国找到他们可以信赖的盟友。

合众社 乔晓光同志担任广西新职

【合众国际社香港二月十七日电】广西电台今天广播，中国共产党任命了广西自治区党委的新书记。

乔被任命为这个华南地区党委第一书记，这是本周宣布的中国第二个省一级最高领导人的提升。乔曾一度担任驻北朝鲜大使，长期以来一直在广西任职。

【本刊讯】瑞士 另共产主义而斗争组织」和 另了共产主义而决裂」两个组织最近在洛桑放映伊文思 罗丽丹拍的电影《意公移山》时散发传单 标题是《不能通过中国的敌人的声音来了解中国》 摘要如下

毛泽东逝世后 全世界不得不承认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完成的宏伟事业 这个事业 就是从贫困 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成为工厂和土地的主人的八亿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

所有那些曾对这个革命的人民大量进行造谣和谩骂的人 现在却急忙改变策略 这些人企图把毛泽东描绘成一种无害的神像 西方报纸正如东方国家的报纸以及修字号 共产党如瑞士人民工人党 意大利共产党 法国共产党 等等一的报纸 伴之以挽词 竭力想把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埋葬掉

然而 在中国 阶级斗争是活生生的 胜利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 对已被击败 但尚未消灭 尚未绝迹

瑞士两个组织散发传单
赞扬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粉碎「四人帮」

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而资产阶级也从未停止过反抗 它寻求可以重新夺取政权的一切途径 打着红旗反红旗

中国人民和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新领导人 他们是通过包括在共产党内进行的 通过发动群众进行的阶级斗争选出这些领导人的 在斗争中断定了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解决了是继续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 四人帮一打着红旗复辟资本主义 把自己打扮成有功的革命者

毛泽东逝世后 一些人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造谣运动 一场广泛的反共运动 帝国主义策划阴谋的场所 中央情报局控制着西方大部分通讯

美国《阶级斗争》刊载伯斯坦文章 《天 翻 地 覆》

在 以美帝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集团破裂的情况下，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面临苏联控制 and 干涉的威胁。最明显的例子是芬兰。芬兰表面上是独立的，但苏联在那里实行经济和政治控制。因此，要了解目前第二世界的问题，必须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角度来看。

毛泽东尽一切力量支持第二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亲自给予在同修正主义斗争中产生的这些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以巨大的援助。在不断帮助和支持第二世界各国革命阶级的同时，毛主席还制订了促使这些国家中的反霸倾向进一步发展的政策，支持每一个反对超级大国统治的斗争。例如，中国对欧洲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问题的重视，具体体现在去年向欧洲共同体派遣了中国大使。

毛主席不厌其烦地告诫同他谈话的每一个欧洲领导人,指出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的危险性。他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赞成绥靖和“缓和”,另一部分不那么赞成绥靖和“缓和”,两者处于严重分裂。他从自己的经历以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中知道,绥靖只能导致加紧侵略,加速战争的爆发。因此,他不断反对绥靖政策,鼓励他们对两个超级大国提高警惕。

修正主义者敌视关于第二世界的观点

修正主义者特别敌视毛主席关于第二世界的观点。社会帝国主义者觊觎欧洲。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使欧洲所有的国家都芬兰化。他们正在准备着要对欧洲各国和全世界人民进行大规模的侵略和战争。他们宣传“缓和”的神话，以便解除欧洲的武装，使欧洲乖乖地屈服于他们。他们憎恨毛主席对欧洲各国和人民提出的要准备应付战争的警告。他们用各种方法诽谤他。但他们的诽谤只不过象一块小小的遮羞布，遮不住毛主席大无畏地揭示出来的赤裸裸的事实。

总之，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概念，回答了革命斗争中区分敌友的问题，指明了如何建立反对以超级大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它具体论证了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因而是美国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第二世界有摇摆的一面，但应该利用其与第一世界的矛盾的一面，鼓励其反霸权的倾向。第一世界，即美国 and 苏联，是主要敌人，各国劳动人民必须坚决地与之作斗争。

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是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制定的。即使在毛主席身患重病，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是重视这个领域。毛主席制定的外交政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充分利用中国这个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的地位，为国际工人阶级谋利益的。由于强调中国应该对于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是在成功地利用压迫者之间的一切矛盾的同时，对全世界的被压迫者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中共中央最近发表的一项声明，概括了毛主席的外交政策，并且保证继续加以贯彻。

中国外交政策的每一方面，都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典范。毛主席大胆地鼓励每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中国赞助亚洲、非洲、中东和其他地方的解放事业，放手给予政治支持和物质援助，并且始终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为发展经济、反对超级大国统治的斗争所作的努力。

例如：当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打破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的封锁，需要修建一条铁路时，他们除非接受一大串附加条件，否则不能指望得到西方大国的帮助。中国挺身而出，提供了零件、设备、货币和技术指导，并且派遣数以千计的工人协助建设这项工程。（五）

霍林沃思
报道

《俄国最新式的核导弹威胁着欧洲》

说苏打算明年将SS—20导弹部署到东部从而威胁中国安全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二月十四日刊登该报防务记者霍林沃思发自柏林的报道，题为《俄国最新式的核导弹威胁着欧洲》，摘要如下：

预计俄国人今夏将在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一带部署非常先进的中程弹道导弹——SS—20。

这样使他们在西欧拥有压倒一切的战场核优势，并能在北约盟国中引起纠纷。这种用固体燃料推动的SS—20导弹便于运输，装有分导多弹头，射程在二千哩以上。这使得这种新导弹不属于目前的限制

战略武器会谈的现有范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只限于讨论能从美国打到苏联和从苏联打到美国的战略导弹。

这种SS—20导弹将取代现已过时的SS—4和SS—5。这两种导弹是用液体燃料推动的，而且是固定在混凝土的发射场上根本不能动的。实际上，当SS—4和SS—5在补充燃料（这个过程需要三十多个小时）的时候，它们就成了法国、英国、更不用说美国的战术核武器的固定目标了。北约高级官员现在在考虑这样三种可能性：

一，试图说服他们的政府发起欧洲西部的华约国家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之间的限制核武器会谈。但是，他们担心这会使美国人接受不了，从而成为一个不好的开端。

二，竭尽全力在英国和法国已研制和控制的设施的基础上，搞一个欧洲的战场武器的核武库。

用巡航导弹作为回答三，要求尽快在西欧部署美国的新的巡航导弹。事实上，这种巡航导弹只是把德国人曾在伦敦上空大量投掷的那种炸弹变得先进了，使之能在低空飞行，而

且能飞得远罢了。

但是，看来战术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之间的差别今后很可能会消失，因此美国人也有可能被拉进来。

俄国人已经用一种轻量的核弹头试验过SS—20了，这种弹头使它的射程达到四千哩以上。据了解，俄国人还在对SS—20作这样的试验：增加这种导弹的各级的推力，以便把它变成洲际导弹。

SS—20使北京感到担心的程度几乎不下于西欧，因为柏林得到的消息表明，苏联打算在明年的某个时候把这种导弹部署到东部去。

对他提出的指控是“极其含糊的”，而且“没有在任何法庭——无论是公开的法庭还是甚至是秘密的法庭——上加以验证”。

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宣称：“今天，对于正义和对新闻自由，都是一个可悲的日子。严重的危险是，可能用对这两个人采取的行动来恫吓其他记者，使之不去进行经过调查研究的报道。”

英国内政大臣决定驱逐两个美国人

周到警察局报到一次。

一名议员高喊：“这是中央情报局要求做的，”里斯回答说：“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任何其他美国机构都未提出过任何要求。”

他追述说，艾吉和霍森鲍尔被指控进行了“有害的活动”。他说：“我对我国的利益感到关注。”

这位大臣所属的工党的议员们在听到上述宣布时高喊“可耻”“捷克斯洛伐克”，而反对党保守党的议员们则说，他们“当然不会对这个决定提出异议”。

【法新社伦敦二月十六日电】雇用霍森鲍尔的《旗帜晚报》在头版发表一篇题为《不公平的判决》的社论说，

【法新社伦敦二月十六日电】英国内政大臣里斯今天证实他已决定驱逐两名美国人——前中央情报局特务菲利普·艾吉和记者马克·霍森鲍尔。

里斯是在议会证实这一点的。

艾吉—霍森鲍尔辩护委员会说，这两个人要在三月一日之前表示希望被驱逐到哪个国家去。在三月一日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他们要每

被英国驱逐的两名美国人提出申诉

【路透社伦敦二月十七日电】美国公民菲利普·艾吉和马克·霍森鲍尔今天说，他们将留在这里，到法庭上去对驱逐他们一事提出申诉。这两个人是作为对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而被命令离开英国的。

四十一岁的艾吉曾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二十五岁的霍森鲍尔是新闻记者。他们昨天被告诉说，他们对驱逐令提出的上诉未能奏效。

这一消息激起了左翼议员和民权组织的强烈抗议。艾吉今晚在爱丁堡说，他打算通过证明下面这样一点来使驱逐令取消：该命令没有负责苏格兰事务的国务大臣的签字是无效的。

苏格兰法律体制是独立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体制的。

在伦敦《旗帜晚报》任记者的霍森鲍尔将要求高等法院同意他进一步上诉。

西德《世界报》刊登维尔纳·马克斯的文章

《西德必须准备一次新的柏林危机》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二月九日发表基民盟—基社盟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主管外交、对德国问题和对安全政策问题的文章，题为《西方必须准备一次新的柏林危机》，摘要如下：

西方必须而且也将

会为如下这一点作好准备：围绕柏林问题将会重新争吵起来。各种迹象表明，苏联这一霸权国恰恰想在西方认为是缓和的试金石的地方，也就是在柏林，引起一次新的危机。

苏联及其那个德国学生，自从七六年十一月底在布加勒斯特举行

华约组织国家会议以来，奉行一条新的与柏林的地位相对的不断激化的路线，这是违背欧安会的所有的条约和协议的。这一运动的目的是要完全把东柏林并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版图，并同时来孤立该城市的西部分，人们声称，四国协定只延伸到这一城市的西部分。所有东方集团国家现在必须抵制在西柏林举行的国际活动。整个东方的新闻界提高嗓门反对联邦总统访问柏林，反对联邦议院的委员会和议会党团在那里举行会议，反对西方政治家参加在这一被分裂的城市里的种种活动，尽管这一切都是完全合法的。

声明、照会、异议、威胁、抗议接连不断。由联邦卡特尔局局长率领的，出席联合国秘书会议的德国代表团受

到攻击。建立欧洲职业训练中心，西柏林参加未来欧洲议会的选举，以及拟议中在柏林设立德国国家基金会，都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联邦外长受到莫斯科和东柏林的公开斥责，因为他陪同他的法国同僚和美国副总统访问西柏林。谁要是分析一下这些事情，分析一下东方宣传工具向他们发出的冷嘲热讽和飞扬跋扈的语言，他就不难看出，这是要试验一下美国新总统及其班子。卡特由于美国发表了支持人权战士萨哈罗夫的声明受到《真理报》的猛烈攻击，他的退缩使人可以猜想，西方人称之为“鹰派”的，那些处理西方问题的莫斯科政治家，错误地觉得现在加强对柏林的进攻时机已到。克里姆林宫人士希望能取得另一些变化。

根据“滴水穿石”的名言，在欧洲中部，西方要维护自己权益的意愿也受到进一步的缩小。

意大利《欧洲人》杂志最近一期报道说

近几年来至少有十七位苏联驻意大利大使馆外交官因从事间谍活动被迫离开了意大利。意大利外交部证实，近几年来有七位苏联外交官被迫离开了意大利，但这是缩小了数字。至少还有十位苏联大使馆官员谨慎地离开了。

一百个是克格勃的特务，而在苏联驻北约国家的使馆中，每四个职员中就有三个是克格勃的特务。据意大利反间谍机构的情报，在意大利至少有六百到七百人是为克格勃工作，这些人当中显然有苏联人，但还有许多是意大利人。

合众社报道

苏对挪威驱逐苏联间谍进行报复

【合众社国际社奥斯陆二月十四日电】挪威今天把苏联的指称斥之为“毫无根据”。挪威政府说，挪威驻莫斯科大使馆两名成员进行了同其身份不相容的活动，因此必须驱逐出境。

苏外交官把挪威驻莫斯科大使馆拉去并告诉他，这是挪威的两名外交官是不受欢迎的。这显然是对挪威政府上月决定把六名卷入非法情报活动的俄国人驱逐出境的报复。挪威外交部发言人赫勒说，我们拒绝这种指责，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月十五日刊登英籍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在香港的演讲，题目是《韩素音讲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现状》，摘要转载如下：

我在中国逗留了两个半月，曾到过我家乡四川省参观，因为它是受“四人帮”干扰最严重的一个省份。你们也许记得，四川是被列入六个在过去三年来受到干扰和破坏的省份之一。

我曾跟中国的文化界人士就“百花齐放”的标准进行交谈，与一些老的知识分子和老画家会面，同时参观访问工厂和农村，与工人、农民谈话。我没有象过去两三年来那样注意机器，相反更着重文化活动方面，因为我认为，在我判断什么正在进行中时，这会给我提供一个标准。我亦到过中国几个地方，参观那些努力将自己建设成为大寨式田园的公社。这次旅程包括山西、西安、四川、苏州、无锡、杭州、上海及北京。杭州在去年也是受到破坏的地方之一。

首先我要谈谈这次参观总的印象。我想，这个总的印象与你们从驻在北京的新闻记者那里听到的是一致的。这就是：中国十分安宁，人民之间充满真正的欢乐以及好些年来没有听到的坦率的直言。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点的真实性，稍后我会向你们介绍为什么。这次我听到很多东西，与很多人交谈过，而这些人在一两年前完全拒绝与我谈及一些我希望要谈的具体问题，包括我自己的家人在内。我同时发现并为之深深感动的是中国人民那种政治上的成熟、思想的深度和对事物的理解，不论他们是工人、农民，还是那些我以前没有见过的知识分子。我想，最好能读读华国锋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在那次讲话中，他谈及政治上的成熟，认为是最值得高兴的事。人们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仅是对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热爱，同时也反映出人民的意愿。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以为中国人民漠不关心、驯顺和不会参与最近的政治事件，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希望把这点谈得更清楚一些，因为跟我交谈的官员们都一再地、非常清楚地阐明这一点。这就是，如果没有人民，如果没有他们的理解，如果没有他们那种普遍地认识到“四人帮”最终所代表的是什么的感情，那末，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就不可能发生。新的领导受到普遍爱戴是毫无疑问的。

同时，中国的八亿到九亿人民——这关乎人类的四分之一——今天正无可怀疑地表现出一种政治的智慧和成熟。他们对国家大事的关心，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无疑，这是文革的成果。中国发表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正是要表明，进步、现代化、提高生活水平并非违反社会主义，事实上社会主义应该使这些东西得以实现。这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得以贯彻社会主义，得以实现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所订下的目标，关键正在这里。在毛的著作中，经常提及一个强大

港报刊登韩素音在香港的演讲

《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现状》

的、现代化的、繁荣的社会主义中国。一些人似乎认为，现在中国提倡现代化，就是放弃了毛的主张，这令我非常惊奇，因为我从毛的著作中见到，过去二十五年来毛一直在主张现代化。所以，并非如某些报道所讲的那样。事实与此相反，毛的政策曾被周恩来创造性地实施，现在仍被推行着。

我了解到“四人帮”夺权的战略是煽动年青人（愈无知愈好）去反对老年人——学生反对老师，年青工人反对老工人及技术人员。为了达到目标，“四人帮”要培育无知的年青人，而不是有文化的有政治觉悟的青年。“四人帮”以为通过网罗年青人（愈无知愈好）去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他们就会夺得政权，因为无知的年青人会忠于他们。文化部和大众传播媒介（舆论工具）特别受到他们的箝制，你们都知道其后果了。我会把我的所见所闻写出来。

我可以指出，在一九七四年年底，那时周总理已患病，毛主席的健康情况也在转坏，同时还有康生、朱德和刘伯承。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四人帮’拥有那么大的权力？”我会说，那是很容易理解的。一旦你看看政治局里的人，你会发觉其中六个人经常在其他省份，很少在北京；另外五、六个则患病或健康衰退，经常不能参加会议，而王张江姚却结成了一个帮，他们可以搞风搞雨。由此可以理解，他们一旦结成死党，就野心勃勃，随意处理政治局的一些文件，甚至把转交给其他委员的文件扣压。他们以政治局名义发出指示，为所欲为。而在一段时间内，很多人还未知悉此事。

在一九七五年，夺权的活动升级。在这种情势下，霹雳一声事情爆发了。这个爆发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逝。在周总理逝世的问题上，“四人帮”命令人们不得哀悼，不允许举行追悼会。但在全中国，到处都有追悼会举行，人们都缠起黑纱，这是对“四人帮”的挑战。在一九七六年一月至四月间，“四人帮”丧失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失去了他们已掌握在手里的年轻人，甚至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控制了宣传机构。他们犯了与希特勒所犯的同样巨大错误。他们相信自己的宣传。

那时，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毛泽东不允许张春桥当总理。张春桥早已觊觎这个位置，他已准备好自己的讲词。事实上他得不到总理的位置，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他要做什么。由于毛主席了解内情，导致华国锋成为总理，不但成为总理，同时兼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党的“第一副主席”这个名称在中国共产党内从来没有出现过，是毛亲手加上去的。这意味着毛选择了华

到那里去，江青也到那里去。他们发下弹药和武器。他们储藏食物。他们控制铁路交通。他们（四人帮）计划在十月八日发难。而在十月六日，他们被捕了。当然，这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解脱。有些官员告诉我——他们曾经有些顾虑，对处理“四人帮”事件，恐怕有人会起来反对，但实际上没有。相反，从那时开始，包括我的故乡四川，情况完全平静——没有武斗；有些自动停止了。

因此，事情的发展使人民如释重负。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认识到有些专家预测中国会发生的混乱、惨剧、内战等事，并没有发生。第二点，我们一定要认识的是，今天的中国出现一种我在最近十二年来没有见过的团结局面。第三件事就是我感到党和人民的关系有了新的改变。他们之间有率直的交谈和不断的和深入的联系。我期望他们能保持这种作风，这是很令人满意的。第四点，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动力来自人民。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华主席数日前在一篇社论里重复这个论点。他提醒说，群众已走在我们的前头。这是对党组织的一个提醒。作为一个领导人，就一定要为人民服务并详细考虑他们所说的话。华国锋确是很得民心，他用一种亲切的态度和人民交谈。当然他也得到军队的支持、人民的支持和党的支持。

现在进行的大规模的整风，以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为基础，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想任何人都了解到，过去三个月的工作是如何巨大。那是极为不寻常的工作。新的领导层的魄力并未在报刊上表现其万一。除了我们从报上得知的会议，还有很多很多的会议正在进行——农业、工业、轻工业、科技、军队等方面的会议，同时举行。中国人现时非常忙碌。中国的前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在“百花齐放”的口号下，所有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了。

最后，在我简短介绍了现时中国的动态之后，我想引述我丈夫的话。今次我的丈夫和我一起访问中国，这是他第五次访问中国。正如你们所知，他是一个印度人，他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印度军队里的一名上校，他又是一名工程师。他说了两点。我的丈夫是很喜欢提出批评意见的。在他前几次访问中国时，他曾很多次提出批评，说他没获知事实，说人们把事情美化了。但今次，他和工人、工程师谈得很愉快，他对于所获告知的事情都很满意。他对我说：“我想毛主席和周总理现在可以安息了。因为毛主席的教导，以及周恩来所毕生致力的事业已在中国人民当中生根了。”他又说：“中国增强了的巨大力量在于她这种伟大的新道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会依靠这种新道德坚持下去。在此点上，她会成为世界的榜样。”

【法新社努瓦克肖特一月三十日电】（记者：让·克里斯托夫·密特朗）题：一九七六年：毛里塔尼亚下赌注的一年

前西属撒哈拉的南方省的“重新统一”——一九七六年，对于毛里塔尼亚领导人来说，乃是下困难赌注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他们既同波利萨里奥阵线打仗，又向不发达状态开战，而且前者要不有损于后者。

自独立以来国防就是被努瓦克肖特政府有点忽视的一个方面，在国家北方边境采取军事行动初期，军队大约只有三千人，而且装备缺乏。国家元首达达赫最近解释说，这个事实说明他的国家相信“国家间的诚挚关系，因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巨大的”。

在一年中，毛里塔尼亚大大增加了军队人数（估计现有为一

万二千人），获得了大量能更好适应新的需要的装备（武装侦察机、装甲车、现代武器、全天候运输工具……）。为了应付这些支出，国防预算从一九七五年的十二亿乌吉亚（等于一亿二千万法国法郎）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近二十亿（二亿法郎），即一年之内增加百分之六十六。

为了使国防预算的增加不加重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负担，毛里塔尼亚就要有新的进款，那就是“国防努力分担额”，这笔进款一九七六年为五亿五千万乌吉亚（五千五百万法国法郎）。此外，还在人民

中开展了支援运动，人民捐献了很多现金和实物。

毛里塔尼亚的经济，从国家主要资源铁矿石一九七六年恢复出口中获得了好处。一九七五年出口是八百七十万吨，一九七六年是一千万吨，增加百分之五十。

去年，国家工业和矿业公司（国营公司）完成了“格尔布”计划的勘测工程，并为毛里塔尼亚这一迄今最大的投资（四亿美元）项目找到了一部分资金。

这项计划将保证目前铁矿的接班，保证毛里塔尼亚的这一原料生产能够达一百年之久。

法新社记者述评

《一九七六年：毛里塔尼亚下赌注的一年》

由于已经得到了资金（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的五千万美元），第一阶段工程将在一九七七年头几个月中开始。此外，国家工业和矿业公司去年在努瓦迪布修建了一个每年将可提炼一百万吨原油的炼油厂和一个小型电力钢铁厂。另一方面，为了推动国家的发展，毛里塔尼亚投入了大的基本建设工程。一九七六年毛里塔尼亚下的赌注看来是赌赢了。但是将来，在中期内，某些阴暗面可能成为对国家经济的一种威胁。

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就会大大影响收支平衡。然而，人们指出，毛里塔尼亚拥有两张重要王牌，无论如何可以使它迅速地发展它的经济。这两张王牌是：许多国家主要是欧洲九国、苏联、沙特阿拉伯、中国、美国、摩洛哥、巴西的援助，和允许很多外国进行投资的国内政治稳定。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月十五日刊登英籍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在香港的演讲，题目是《韩素音讲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现状》，摘要转载如下：

我在中国逗留了两个半月，曾到过我家乡四川省参观，因为它是受“四人帮”干扰最严重的一个省份。你们也许记得，四川是被列入六个在过去三年来受到干扰和破坏的省份之一。

我曾跟中国的文化界人士就“百花齐放”的标准进行交谈，与一些老的知识分子和老画家会面，同时参观访问工厂和农村，与工人、农民谈话。我没有象过去两三年来那样注意机器，相反更着重文化活动方面，因为我认为，在我判断什么正在进行中时，这会给我提供一个标准。我亦到过中国几个地方，参观那些努力将自己建设成为大寨式田园的公社。这次旅程包括山西、西安、四川、苏州、无锡、杭州、上海及北京。杭州在去年也是受到破坏的地方之一。

首先我要谈谈这次参观总的印象。我想，这个总的印象与你们从驻在北京的新闻记者那里听到的是一致的。这就是：中国十分安宁，人民之间充满真正的欢乐以及好些年来没有听到的坦率的直言。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点的真实性，稍后我会向你们介绍为什么。这次我听到很多东西，与很多人交谈过，而这些人在一两年前完全拒绝与我谈及一些我希望要谈的具体问题，包括我自己的家人在内。我同时发现并为之深深感动的是中国人民那种政治上的成熟、思想的深度和对事物的理解，不论他们是工人、农民，还是那些我以前没有见过的知识分子。我想，最好能读读华国锋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在那次讲话中，他谈及政治上的成熟，认为是最值得高兴的事。人们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仅是对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热爱，同时也反映出人民的意愿。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以为中国人民漠不关心、驯顺和不会参与最近的政治事件，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希望把这点谈得更清楚一些，因为跟我交谈的官员们都一再地、非常清楚地阐明这一点。这就是，如果没有人民，如果没有他们的理解，如果没有他们那种普遍地认识到“四人帮”最终所代表的是什么的感情，那末，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就不可能发生。新的领导受到普遍爱戴是毫无疑问的。

同时，中国的八亿到九亿人民——这关乎人类的四分之一——今天正无可怀疑地表现出一种政治的智慧和成熟。他们对国家大事的关心，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无疑，这是文革的成果。中国发表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正是要表明，进步、现代化、提高生活水平并非违反社会主义，事实上社会主义应该使这些东西得以实现。这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得以贯彻社会主义，得以实现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所订下的目标，关键正在这里。在毛的著作中，经常提及一个强大

港报刊登韩素音在香港的演讲

《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现状》

的、现代化的、繁荣的社会主义中国。一些人似乎认为，现在中国提倡现代化，就是放弃了毛的主张，这令我非常惊奇，因为我从毛的著作中见到，过去二十五年来毛一直在主张现代化。所以，并非如某些报道所讲的那样。事实与此相反，毛的政策曾被周恩来创造性地实施，现在仍被推行着。

我了解到“四人帮”夺权的战略是煽动年青人（愈无知愈好）去反对老年人——学生反对老师，年青工人反对老工人及技术人员。为了达到目标，“四人帮”要培育无知的年青人，而不是有文化的有政治觉悟的青年。“四人帮”以为通过网罗年青人（愈无知愈好）去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他们就会夺得政权，因为无知的年青人会忠于他们。文化部和大众传播媒介（舆论工具）特别受到他们的箝制，你们都知道其后果了。我会把我的所见所闻写出来。

我可以指出，在一九七四年年底，那时周总理已患病，毛主席的健康情况也在转坏，同时还有康生、朱德和刘伯承。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四人帮’拥有那么大的权力？”我会说，那是很容易理解的。一旦你看看政治局里的人，你会发觉其中六个人经常在其他省份，很少在北京；另外五、六个则患病或健康衰退，经常不能参加会议，而王张江姚却结成了一个帮，他们可以搞风搞雨。由此可以理解，他们一旦结成死党，就野心勃勃，随意处理政治局的一些文件，甚至把转交给其他委员的文件扣压。他们以政治局名义发出指示，为所欲为。而在一段时间内，很多人还未知悉此事。

在一九七五年，夺权的活动升级。在这种情势下，霹雳一声事情爆发了。这个爆发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逝。在周总理逝世的问题上，“四人帮”命令人们不得哀悼，不允许举行追悼会。但在全中国，到处都有追悼会举行，人们都缠起黑纱，这是对“四人帮”的挑战。在一九七六年一月至四月间，“四人帮”丧失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失去了他们已掌握在手中的年轻人，甚至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控制了宣传机构。他们犯了与希特勒所犯的同样巨大错误。他们相信自己的宣传。

那时，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毛泽东不允许张春桥当总理。张春桥早已觊觎这个位置，他已准备好自己的讲词。事实上他得不到总理的位置，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他要做什么。由于毛主席了解内情，导致华国锋成为总理，不但成为总理，同时兼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党的“第一副主席”这个名称在中国共产党内从来没有出现过，是毛亲手加上去的。这意味着毛选择了华

国锋。在那里去，江青也到那里去。他们发下弹药和武器。他们储藏食物。他们控制铁路交通。他们（四人帮）计划在十月八日发难。而在十月六日，他们被捕了。当然，这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解脱。有些官员告诉我——他们曾经有些顾虑，对处理“四人帮”事件，恐怕有人会起来反对，但实际上没有。相反，从那时开始，包括我的故乡四川，情况完全平静——没有武斗；有些自动停止了。

因此，事情的发展使人民如释重负。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认识到有些专家预测中国会发生的混乱、惨剧、内战等事，并没有发生。第二点，我们一定要认识的是，今天的中国出现一种我在最近十二年来没有见过的团结局面。第三件事就是我感到党和人民的关系有了新的改变。他们之间有率直的交谈和不断的和深入的联系。我期望他们能保持这种作风，这是很令人满意的。第四点，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动力来自人民。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华主席数日前在一篇社论里重复这个论点。他提醒说，群众已走在我们的前头。这是对党组织的一个提醒。作为一个领导人，就一定要为人民服务并详细考虑他们所说的话。华国锋确是很得民心，他用一种亲切的态度和人民交谈。当然他也得到军队的支持、人民的支持和党的支持。

现在进行的大规模的整风，以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为基础，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想任何人都了解到，过去三个月的工作是如何巨大。那是极为不寻常的工作。新的领导层的魄力并未在报刊上表现其万一。除了我们从报上得知的会议，还有很多很多的会议正在进行——农业、工业、轻工业、科技、军队等方面的会议，同时举行。中国人现时非常忙碌。中国的前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在“百花齐放”的口号下，所有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了。

最后，在我简短介绍了现时中国的动态之后，我想引述我丈夫的话。今次我的丈夫和我一起访问中国，这是他第五次访问中国。正如你们所知，他是一个印度人，他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印度军队里的一名上校，他又是一名工程师。他说了两点。我的丈夫是很喜欢提出批评意见的。在他前几次访问中国时，他曾很多次提出批评，说他没获知事实，说人们把事情美化了。但今次，他和工人、工程师谈得很愉快，他对于所获告知的事情都很满意。他对我说：“我想毛主席和周总理现在可以安息了。因为毛主席的教导，以及周恩来所毕生致力的事业已在中国人民当中生根了。”他又说：“中国增强了的巨大力量在于她这种伟大的新道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会依靠这种新道德坚持下去。在此点上，她会成为世界的榜样。”

【法新社努瓦克肖特一月三十日电】（记者：让·克里斯托夫·密特朗）题：一九七六年：毛里塔尼亚下赌注的一年

前西属撒哈拉的南方省的“重新统一”——一九七六年，对于毛里塔尼亚领导人来说，乃是下困难赌注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他们既同波利萨里奥阵线打仗，又向不发达状态开战，而且前者要不有损于后者。

自独立以来国防就是被努瓦克肖特政府有点忽视的一个方面，在国家北方边境采取军事行动初期，军队大约只有三千人，而且装备缺乏。国家元首达达赫最近解释说，这个事实说明他的国家相信“国家间的诚挚关系，因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巨大的”。

在一年中，毛里塔尼亚大大增加了军队人数（估计现有为一

万二千人），获得了大量能更好适应新的需要的装备（武装侦察机、装甲车、现代武器、全天候运输工具……）。为了应付这些支出，国防预算从一九七五年的十二亿乌吉亚（等于一亿二千万法国法郎）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近二十亿（二亿法郎），即一年之内增加百分之六十六。

为了使国防预算的增加不加重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负担，毛里塔尼亚就要有新的进款，那就是“国防努力分担额”，这笔进款一九七六年为五亿五千万乌吉亚（五千五百万法国法郎）。此外，还在人民

中开展了支援运动，人民捐献了很多现金和实物。

毛里塔尼亚的经济，从国家主要资源铁矿石一九七六年恢复出口中获得了好处。一九七五年出口是八百七十万吨，一九七六年是一千万吨，增加百分之五十。

去年，国家工业和矿业公司（国营公司）完成了“格尔布”计划的勘测工程，并为毛里塔尼亚这一迄今最大的投资（四亿美元）项目找到了一部分资金。

这项计划将保证目前铁矿的接班，保证毛里塔尼亚的这一原料生产能够达一百年之久。

法新社记者述评

《一九七六年：毛里塔尼亚下赌注的一年》

由于已经得到了资金（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的五千万美元），第一阶段工程将在一九七七年头几个月中开始。此外，国家工业和矿业公司去年在努瓦迪布修建了一个每年将可提炼一百万吨原油的炼油厂和一个小型电力钢铁厂。另一方面，为了推动国家的发展，毛里塔尼亚投入了大的基本建设工程。一九七六年毛里塔尼亚下的赌注看来是赌赢了。但是将来，在中期内，某些阴暗面可能成为对国家经济的一种威胁。

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就会大大影响收支平衡。然而，人们指出，毛里塔尼亚拥有两张重要王牌，无论如何可以使它迅速地发展它的经济。这两张王牌是：许多国家主要是欧洲九国、苏联、沙特阿拉伯、中国、美国、摩洛哥、巴西的援助，和允许很多外国进行投资的国内政治稳定。